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玫瑰和夜莺

在伊朗寻找传统的无治主义

哈基姆·贝

哈基姆·贝
玫瑰和夜莺
在伊朗寻找传统的无治主义
2003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peter-lamborn-wilson-roses-and-nightingales>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2003

目录

简介	3
音乐、茶和玻璃杯	6
苏菲主义。伊斯兰教的”传统无治主义”？	9
伊朗？……还是波斯？	13

的、中世纪的、迷信的、反进步的、晚期的和颓废的东西-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中的所有”东方”东西。但这块土地和它的人民（或其中一些人）仍然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并且热爱它。

我知道我说我也爱它是完全不合法的，也是无法辩解的。我知道我是一个局外人（尽管有时我说服自己不是这样）；我知道我不能”代表他人”，甚至整个代表项目在后现代性的”废墟”中已经变得可疑。我甚至知道，整个嬉皮士的浪漫旅行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当然也注定要失败。”后殖民主义话语”已经完美地、痛苦地说明了这一切。然而，可悲的是，我无法忏悔，也无法将我的经历写成无关紧要的、隐性的反应性妄想。

新闻中的”伊朗”，一个由穿黑袍的邪恶狂热分子控制的油井和原子反应堆的二维图像……这个”伊朗”比我试图旅行甚至失去自我的”波斯”更真实吗？”玫瑰和夜莺的波斯”如此明智地影响着我的记忆？或者，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和不真实？真相肯定要比这种悖论所暗示的更加复杂。但是，由于”伊朗”现在被媒体鼓吹为邪恶轴心国的下一个代言人，我怀疑”波斯”在未来几年中会得到同样多的宣传。因此，这篇文章。波斯”已经成为”我们失去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香水味萦绕着，即使它退到了一半想象的过去。它留下的只是一些可能被称为差异的东西。否则，如何定义我们感到正在离开我们的东西？

简介

军事独裁者雷扎·沙阿·巴列维于1935年将波斯的名字改为伊朗。此举是通过颂扬一个基本上是假想的印度-雅利安人的过去来建立国家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当时该领土正在应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干涉，以及外国石油公司日益增长的权力。

今天，伊朗被列入”邪恶轴心”的候选名单，这意味着伊朗人民一直受到布什-切尼政权的大规模屠杀幻想和新殖民主义野心的威胁。那么，着眼于当前的事件，我们介绍彼得-兰博恩-威尔逊的《玫瑰与夜莺》，这是他1970年代初在东南亚旅行时遇到的异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欣赏。

威尔逊将苏菲主义的边缘元素与一种文化倾向联系起来，尽管民族主义现代化、欧洲帝国主义渗透程度加深以及政府镇压不断升级，但这种文化倾向仍然顽强地存在。在威尔逊的调查过程中，他认为他发现了前伊朗波斯的遗迹和丰富的非正统伊斯兰教（和前伊斯兰教）实践。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苏菲派为追求狂喜而对禁欲主义和放荡不羁的情感极端的探索，都让那些恪守严格的伊斯兰教义和其他僵化的法律和秩序机构感到震惊。

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很欣赏威尔逊，认为他是一个对非主流奥秘的知情观察者，他努力在伊斯兰社会的历史中找出那些珍视自由和想象力的线索，这一点很有洞察力。总的来说，苏菲派是一个穆斯林群体，他们的做法与阿亚图拉寡头、沙特贵族家族以及真主党和基地组织的杀人不眨眼的猪猡对该宗教的压迫性使用相悖。

当玩世不恭的新保守主义者和充满仇恨的右翼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新十字军夸大伊斯兰社会的暴虐特征，以妖魔化和贬低任何与阿拉伯和穆斯林有关的东西时，任何对这种文化的积极评价，只要不顾国家安全局对种族主义、偏见和省略主义的利用，都是值得欢迎的。

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对威尔逊在这些亚文化中对神秘主义的拥抱和对厌女症的容忍感到恼火。一些读者（连同 FE 编辑部的一些成员，包括我自己）认为不可能将任何形式的有神论的任何方面—无论多么无法无天的兴奋或狂喜—与自由、互助和团结相调和。

但我想起了几天前的一个谈话，我和我的朋友 Sayeedeh 就苏菲主义和政治异议的话题进行了讨论。在 1978 年 9 月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和警察骚乱的血腥循环之后，她和她德黑兰大学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同志一样，受到了忠于国王的暴徒和支持霍梅尼的人的生命威胁。当她最终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时，她在一些贫穷的苏菲派的帮助下，沿着夜色中的铁路线逃离。当我问她为什么苏菲派苦行僧会帮助一个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躲避警犬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的追捕时，赛义德提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异端和激进的原始主义者扬-胡斯的话题。

在追随胡斯的反封建农民和工匠反叛运动中，是否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有些人使用基督教语言和符号只是作为表达他们所经历的深刻社会危机的现实的手段？也许威尔逊也从同样的角度来欣赏苏菲主义。

- 道格-格雷夫斯

那是 1971 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走了两年的嬉皮士之路，在阿富汗度过了一个贫穷的冬天，在奎达（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首府）吸了几个月的鸦片，接着又得了严重的、令人产生幻觉的肠道疟疾，我在伊朗领事眼里一定不是很体面。

领事馆是一个位于奎达一个沉闷的新郊区的混凝土盒子，除了我和领事之外，似乎空无一人，领事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小个子酸儒，除了让我个人生活困难之外，他似乎无事可做。他在询问我，为什么他不简单地给我签发 14 天的过境签证，而不是我想要的标准的旅游三个月签证。他似乎怀疑我有问题。最近，我被赶出了印度和阿富汗。显然，领事认为我是一个没有财富的流浪者，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敏锐的。

“你为什么要访问我的国家？”他不停地问。

我觉得太累了，无法编造什么，于是我说：“嗯，你看，我对苏菲主义感兴趣……”

“苏菲主义！？你知道什么是苏菲主义吗？”

伊朗？….. 还是波斯？

通过在印度和伊朗旅行，而不仅仅是阅读它们，我开始欣赏并真正爱上了某些“晚期颓废时期”，这些时期被东方主义者普遍鄙视为美学上的不纯洁，被新一代伊斯兰教偏执者鄙视为宗教上的不纯洁，被亲西方的现代主义者鄙视为中世纪的不纯洁。几乎唯一不鄙视这些晚期颓废时期的人是那些实际上仍然生活在这些时期的人，他们太无知和落后了，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无关性、过时性、政治不正确性和不纯洁。在印度，莫卧儿时代后期的残余仍然为许多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幽灵般的忧郁但精致的矩阵。在伊朗，它是卡贾尔时期（巴列维王朝之前的王朝）；这段历史足够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故事（如萨夫瓦特博士关于穆斯塔克的故事），通过建筑、绘画、音乐、手工艺品、诗歌，甚至食物来触摸它。过去的历史以一种美国人甚至欧洲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它的存在足以让人们几乎可以生活在其中。

晚期颓废时期吸引我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它们通常相当和平（对战争来说太累了，太淡定了）；它们往往致力于“小幸福”—正如尼采所说，这可能比大幸福更重要，那些总是背叛我们的幸福。也许伟大的原创艺术在这样的时期无法茁壮成长—因为国王和领主再也负担不起—但“小艺术”往往经历一种完美；贵族的品味（以廉价的民间形式）甚至渗透到最低层。我记得在德黑兰的一个深冬的夜晚，当我经过一个建了一半的伪加州办公大楼的骨架时，我看到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一桶燃烧的垃圾旁取暖；他穿着羊皮大衣，对着雪花朗诵哈菲兹，自娱自乐。

“伊朗”是波斯的正式古称，但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是官方名称，由礼萨-沙阿（最后一位已故沙阿的父亲）下令将“波斯”改为“伊朗”。他这样做的动机令人怀疑，因为他是纳粹的同情者，而且“伊朗”意味着“雅利安人的土地”—这一改名在许多伊朗人的口中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波斯”这个名字应该代表所有落后

避开宗教和瑜伽的繁琐道路，像小偷一样溜进天堂，可以说。在民间传说中，”聪明人”成为一个喜剧人物，如著名的穆拉-纳斯罗丁（Mulla Nasroddin），外表是一个傻瓜，但实际上是一个已实现的圣人。

”我知道得够多了，想知道更多。我在印度遇到的一些苏菲教徒告诉我去伊朗。所以……”

领事在我眼前蜕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有修养、有诗意的灵魂，被不公平地、莫名其妙地寄放在俾路支省的这个空荡荡的水泥盒子里。他没有屈服。他喜笑颜开：”这真是太棒了！”。你必须让我给你尽可能多的签证，”他开始摸索着盖章和戳记，”一年，可以延期，是吗？”

”嗯……但是……”

”你必须留在我的国家，直到你学会一切。请答应我！”

虽然我从未了解过领事国家的”一切”，甚至没有了解过苏菲主义，但我确实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或多或少，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一个选择问题；在这本小小的回忆录中，什么该删掉，什么该放进去。我遵循领事不屈的主题所提出的一条松散的线索，即他从官僚到人的奇怪转变。我这样做的动机来自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将没有人讨论波斯文化的这些方面。伊朗将被归入邪恶的伪话语和”新闻”的空洞想象中。波斯人文主义（正如伊克巴尔所称）将被遗忘、否认，甚至背叛—正是因为它不属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的领域，而是属于”日常生活”和灵魂的平凡甚至无法表达的美。

音乐、茶和玻璃杯

一个奇怪的巧合是，只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才可能出现的，当时对古典音乐进行传统和创造性保护的最强大力量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相比之下，德黑兰电台代表了一种可爱但不纯洁的新传统主义，它甚至跑到了小提琴和钢琴的实验中，我喜欢波斯钢琴音乐，它总是让我想起什叶派墓祠和其他 19 世纪末公共建筑的镜面马赛克建筑。就像钢琴（大部分是直立的）一样，欧洲的镜子被大篷车运到伊朗，自然有很多镜子在途中坏了。

瓷砖马赛克工匠们用骆驼驮着碎片，创造了一种粗俗但闪烁的混合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整个穹顶和天井都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冰钻照明。纯粹主义者讨厌这种东西。钢琴被重新调成波斯模式，并像杜冷丁一样演奏，没有踏板，只用四个手指。另一个比较：在整个亚洲，传统的刺绣技术因脚踏式辛格缝纫机的引入而获得了创造性的爆发。现代技术（与资本密不可分）迟早会窒息并摧毁传统工艺，但最初的接触往往是一种刺激，并催生了充满活力的混合体。

尽管如此，电视音乐家们都是严格但有创造性的纯粹主义者，1970 年代见证了优秀波斯音乐的小型文艺复兴：由非常年轻的爱好者和非常老的演奏家演奏，他们被新浪潮和电视预算从遗忘中拯救出来。设拉子音乐节是其中中心之一。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电视台的“伊朗传统音乐保护和传播中心”主任达里什-萨夫瓦特博士交谈。在设拉子的一个晚上，萨夫瓦特博士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已经知道它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娜斯罗拉-普亚瓦迪和我在《爱的国王》中写过它，这是我们对尼玛托拉希苏菲教团的历史和诗歌的研究，是尼玛托拉-瓦利国王的精神后裔。1792 年，这些苦行僧之一在克尔曼殉难；他的苏菲名字叫穆斯塔克-阿里-沙阿，他是一个尼德祖布，一个完全沉浸在神性狂喜中的苏菲“疯子”。他也是一位传奇的音乐家，会弹奏中亚的小三弦琵琶 sehtar（印度西塔琴的祖先）。有一天，穆斯塔克在疯狂中为附近清真寺的祈祷召唤

教派被称为“真理之民”（与苏菲殉道者哈拉伊所宣称的神名相同）。这不是一个苏菲教派，而是一种民间宗教，是前拜火教异教徒、极端什叶派、苦行僧苏菲教，或许还有摩尼教的混合体。Ahl-i Haqq 的一个分支实际上崇拜撒旦，吃猪肉，喝葡萄酒；我的几个朋友曾到他们的偏远山谷旅行，发现他们相当热情好客。正统的“阿赫拉哈克”在德黑兰建立了一个 Jamkhaneh 或聚会所，由一个有魅力的 shaykh，即著名的音乐家和 sehtar 大师 Ustad Elahi 主持。许多德黑兰的音乐家都被他吸引为弟子，一些西方人也是如此，包括我的朋友、法国民族音乐学家 Jean During。Ustad Elahi 的儿子用法语和英语写过书。

有些苏菲是很 Darvishi 的，比如 Ni' matollahi 教团的 Safi Ali Shahi 分支，他们在德黑兰拥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khaniqah（有花园和瓦片圆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德黑兰电台的专业音乐家，他们中的一些人（人们这样说）吸食鸦片。有一次我在他们的花园里参加了一场时尚的葬礼，因为苦行僧们把花园租给了这种场合。其他苏菲教徒为此批评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懒汉。无论如何，不是所有的苏菲都是达维希。

过去，苏菲主义偶尔会把它的“传统无治主义”发挥到对不公正的武装起义，但在近代，它把精力转移到神学和思想解放上，把它的野性运用到更内在的层面。从政治角度解读，苏菲主义为反抗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想想哈菲兹的台词：“用酒染上你的祈祷地毯！”如果从文化角度解读，苏菲主义正是通过抵制传统的“死重”而引发了无数次传统文化的复兴。例如，19 世纪末波斯古典音乐的巨大变化—更大的合奏、新的旋律材料、对欧洲影响的实验—都是由苏菲派或深受苏菲文化影响的艺术家完成的。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激进的宽容”可能被证明是不可能成为政治纲领的，但它总是可以被艺术家内化并外化为艺术。由于“东方”从未真正经历过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除非是殖民帝国主义强加的），它在苏菲主义和艺术的“允许的异议”中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浪漫主义抵抗形式。

在巨大的压迫条件下，苦行僧会变成 Rndi，也就是说，聪明。伦迪可以在法律的眼皮底下喝酒，而且还能逃过一劫。苦行僧是一个自我照亮的密探，是神秘的僧侣和恶作剧的超现实主义者的奇怪组合。也许这就是古德杰夫发现他的“聪明人”概念的地方，他

在过去（比如说，直到 19 世纪中期），伊朗苦行僧坚持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与印度的印度教萨都斯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长发（或剃光头）、打补丁的斗篷、乞讨碗（用椰壳做的）和仪式用的斧头（也可用于切菜）、独特的帽子或塔伊（“皇冠”）；无休止的漫游、音乐和舞蹈，有时喝酒和吸食大麻，对正统的要求持无所谓的态度；瑜珈禁欲主义和放荡不羁，以及狂喜的爱神学。Ni' matollahi 教团曾是这种苦行僧的先锋，但强大的毛拉（其中一位被称为苏菲-库什或“苏菲杀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甚至因异端而被处决（如穆斯塔克-阿里-沙赫），这使激进的苦行僧逐渐转入地下。在内部，他们保留了反清教的信念，但在外部，他们符合正统的什叶派。一些谢赫甚至穿着深色的长袍，戴着雪白的头巾，装扮成毛拉。

野生的卡兰达里式的苏菲主义可能比伊斯兰教更早，它可以追溯到印度-伊朗的古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印度和伊朗经文（《吠陀》和《雅什》）中的共同萨满教文化。致幻植物（称为 Soma 或 Haoma）在这种宗教中肯定发挥了核心作用。首先，正统的婆罗门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把这些植物的力量推到了“异端”的外部黑暗中，或者“忘记”了它们，或者把它们变成了隐喻，就像许多平庸的苏菲诗歌中没有味道的“酒”。

但苦行僧主义抵制变化。在等级森严的亚洲世界里，有一套僵化的继承身份，苦行僧的生活总是提供了一条出路，一种传统的波希米亚主义，不完全被权威认可，但至少被认为是一个可行的身份。难怪嬉皮士们会立即倾向于与这些“有 1000 年历史的 beatniks”为伍，他们有着同样的零工作伦理，对麻醉剂和幻觉的偏爱。在印度，我发现有很多苦行僧和萨德教徒，但在伊朗，他们大多已经消失了，至少在外表上。唯一有补丁的斗篷属于一个叫 Khaksariyya 或“尘头”的教团（就像在爱人门口的尘土中跪拜，或在哀悼时将尘土扔在头上的形象）。在设拉子，我在他们的一个名为“七体”的美丽花园中的卡尼卡里参加了开斋仪式，他们在那里诵读哈菲兹，然后熄灭灯光，在黑暗中哭泣。披着补丁的哈克萨里苦行僧偶尔仍会四处乞讨或出售对抗邪眼的香火（esphand 又名叙利亚芸香，摄入后会产生强烈的致幻作用；也可用于制作红色染料的 fezzes）。我知道伊斯法罕有一家茶馆，员工都是哈克萨里苦行僧，领班是他们的谢赫，他背诵史诗《沙赫纳赫》的所有部分，就像一个人的戏剧。哈克萨里教团与一个奇怪的库尔德教派有联系，这个

（阿赞）伴奏，这一亵渎行为引起了一位偏执的毛拉的清规戒律的愤怒。毛拉号召满堂的人用石头砸穆斯塔克-阿里-沙阿，他和他的一个弟子一起被砸死了。萨夫瓦特博士给我讲了一遍这个故事，但他并没有在书上读到过这个故事。他年轻时从一位老音乐家朋友那里听说的，他的祖父在 1792 年 5 月 19 日确实在克尔曼，并目睹了穆斯塔克的死亡。

20 世纪 70 年代的 Ni' matollahi 教团仍然非常支持音乐（尽管他们在实际的苏菲实践中从未使用过乐器）。每年有几次快乐的节日，如先知或阿里的生日，德黑兰市中心的尼玛托拉希卡尼卡[或“精神中心”]会组织一个 jashn，或音乐节。贾瓦德-努尔巴赫什博士是该教团的教主或谢赫，他的弟子和朋友中有许多音乐家，他们都乐意在他的聚会上表演。来自德黑兰各阶层和各地区的数千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会参加，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免费的米饭和肉的热餐，以及他们能吃到的所有茶和糖果，还有几个小时的优秀传统音乐。压轴戏总是由一群来自库尔德斯坦的狂野的卡迪里苦行僧提供，他们用戏剧性的颂歌和敲击的鼓声将人群唤醒，使之陷入疯狂。努尔巴赫什博士告诉我们，在库尔德斯坦的家里，他们会在音乐之后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举动，比如把刀子插进脸颊或吃灯泡。”但在我的 Khaniqah 里，我不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眼神闪烁地说道。”如果你想看那种巫术，你就得去萨南达吉。”

于是，我们当然就去了。

在伊朗人之后，库尔德人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都（除了毛拉）采用了西式服装，其结果通常是反美学的。库尔德人的穿着是库尔德式的：大流苏头巾，紧身士兵夹克，宽松的裤子，马靴，还有枪，如果他们能逃脱的话。妇女们穿着几十种或几十种深色的、丰富的、饱和的、天鹅绒般的分层花纹衬裙，看起来像黑色的郁金香；有些人在脸上纹上蓝色的印记，然后揭开盖子走。

在萨南达季，我和我的朋友们-我们都是为德黑兰英文日报工作的美国记者，都对苏菲主义着迷，遇到了努尔巴赫什博士的联系人，他是一位 88 岁的老先生，住在卡迪里教堂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他邀请我们进屋喝茶，并给我们看了一张他穿着军装的老照片，他的肩膀上挂着一条非常巨大的活蛇。”你是来看我们吃玻璃的，

我的年轻朋友？啊，这不算什么。一个人甚至不需要进入恍惚状态就可以玩这种把戏。我给你们看！”

他打了个响指，他的小孙子端来一个银质托盘，上面放着一个灯泡。老兵一边说着咒语，一边用手指把它掰开，然后开始舀起碎片，把它们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响。吞下。当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时，他眨了眨眼睛，把托盘递给我们：“你们想自己试试吗？”

那天晚上在卡尼卡（在围绕着沙发或餐布的地板上吃了一顿羊肉和茶的大餐后），我们确实目睹了力量的壮举，包括烤脸颊、吃电、处理蝎子、咬灯泡—所有这些动作（在真正令人振奋的齐克尔之后）都没有任何损伤或可见的疤痕。后来我多次访问萨南达季，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把戏很快就显得相当普通（尽管我自己从未尝试过）。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们这位小个子老兵朋友的壮举。在通过狂舞和旋转来实现哈尔或精神恍惚之后，他突然以极快的速度跑过整个房间（至少说是一个网球场的长度）；像火箭一样把自己头朝下发射到空中，把头骨撞到远处的墙上，然后跳下来，站起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不停地旋转、跳舞和狂喜地唱歌。我相信就是这个人告诉我们，巴格达的卡迪里苏菲教团的大谢赫能够砍掉他的弟子的头，作为入教仪式的一部分，然后换上他们，没有任何伤害。在看到这位老军人亲自表演后，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虽然我承认后来我又开始怀疑了。但这是个不错的故事。

苏菲主义。伊斯兰教的”传统无治主义”？

逊尼派伊斯兰教”建立”在五大支柱之上。统一的忏悔，对先知和天使的信仰，祈祷，朝圣，以及贫民税。除此以外，什叶派还增加了第六个支柱。社会正义。什叶派通常是作为一个没有国家权力的宗教而存在的，传统上是作为对逊尼派的潜在反叛的来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义支柱”被赋予了更广泛的解释。已故的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ati）是一位被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暗杀的激进毛拉，他使许多伊朗人皈依了什叶派社会主义的概念。沙里亚提的小册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与对阿里和侯赛因作为反抗国家压迫的反叛者的崇敬的奇妙融合。今天伊朗的官方革命国家什叶派已经采取了另一个方向，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特别激进。但社会正义的什叶派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相当牢固的历史和现实的，而且总是能够再生的。伊朗一般被描述为 90% 的正统什叶派，这可能是事实。

但苦行僧和异教徒所起的作用比这种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在”肥胖”的伊朗人里面，一个”瘦弱”的苦行僧经常为自我表达和自由而斗争。当然，苏菲是非常虔诚的，但苦行僧（即使没有外在的迹象和做法）也允许对所有沉闷的顺从主义、阶级窒息、清教徒主义、过于正式的礼仪和菲律宾式的共识美学进行嘲笑。在现代波斯语中，darvishi 这个形容词意味着这种态度和品味的整个综合体，甚至不一定与任何苏菲赞美有关。它的意思是”悠闲”、”酷”、非正式和放松（”不要穿衣服吃饭，我们会很 darvishi”）；还有”时髦”和波希米亚的意思。在我看来，苦行僧和奇怪的教派（太多了，甚至无法在这篇文章中列出）对波斯文化甚至广义上的”政治”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传统无治主义”。